

新旅文化



基督教与清季中国的教育与社会

王树槐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树槐 著

基督教与清季中国 的教育与社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经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宇宙光出版社)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0-14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与清季中国的教育与社会 / 王树槐 著.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495-0332-2

I. ①基… II. ①王… III. ①基督教-影响-教育-研究-中国-清代 ②基督教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G529.49
②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0463 号

出品人:郑纳新
策 划:郑纳新
责任编辑:庠文妍
装帧设计: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6

字数:150千字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自序

我初次接触基督教文化是在小时候住了几次教会医院,对教会医院留下深刻的印象,对西洋医学,尤其是外科开刀,深感钦佩。至于接触到基督教教义,是在我进入台湾大学之后,在同学的带引下,参加主日聚会和圣经班,目的在学英文。我进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想写一本专刊,正好本所新购《万国公报》微卷一份,非常可贵,我就利用这批微卷,撰成《外人与戊戌变法》一书,这是我的第一本书,颇得好评,因之我想以研究基督教在华的社会工作和文化事业作为我一生研究的主要课题。我到夏威夷大学进修时,便选了基督教教育会作为我的硕士论文,回台后便发表《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一文。因为搜集一些其他有关基督教的资料,所以又陆续发表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的文章。本集收集本人的七篇文章,除江苏省的教案与江苏的禁烟运动外,大都是我在留学时收集的一些资料。其实与传教士有关的,以《外人与戊戌变法》一书中传教士的言论与活动较为重要,对中国政治影响甚大,唯牵涉的人与事,除传教士外,尚有其他外国人士与机构。后来因为有关基督教在华的社会工作与文化事业的资料,在台颇不易获得,我就放弃原来的构想,转而研究其他问题。其实基督教在华的工作,除传

教外,尚有许多社会工作与文化事业等,都曾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实在是值得终生投入的研究工作,幸而有其他同好加入研究,而且成果丰富。宇宙光除了召开各种专题讨论会,出版许多学术专著及论文集外,今为纪念马礼逊入华宣教二百年,收集有关基督教中文论文达三十册之多,本人的几篇小文,亦在其列,感到非常高兴与荣幸。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理性而务实的民族,其能维持五千余年而绵延不绝,固有其文化上的优点,而民族国家之大,包含许多少数民族,成为大一统的国家,不像欧洲四分五裂,各自成立许多独立的国家,不得不归功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以文化力量将各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王道文化:对国内各民族,允许各自保留其文化特性,但能融合成为大一统的国家;对外邻近的各民族国家,只需尊崇中国皇帝,奉正朔,即封为进贡的、自治的国家,并不灭其国。此与欧洲霸道文化的国家(后来成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在思维与体制上完全不同。中国自古即有世界大同的理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就理性而言,中华文化中没有强烈的宗教思想,儒家思想只是现实政治、社会的伦理思想,祭奉天地君亲师,只是崇拜、景仰与报恩的综合思维,严格地说,这不是宗教。即使说祭天祀祖谓之宗教,但政教并未强烈地结合在一起,中华文化中,很早就出现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通常的情况是政治统御宗教,政治力量超越宗教之上,虽有少数皇帝偏信某一宗教,但只是他个人的行为与信仰,并未改变中国人文主义的传统,因之中国对外来的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景教、祆教等,并不排斥。虽然有若干人士有非难外教的言论,但此种情况极为少数。唐代武宗因其个人信奉道教而排斥佛教、伊斯兰教、景教、祆教,但此为其个人的思想问题,且在位仅六年,各教虽然受挫一时,佛、伊教并未受到大的打击,佛教已深入中国社会,伊斯兰教以贸易为主,不在传教,只有景教、祆教,以传教为主,而信徒很少,故一蹶不振。检视中国长远的历史,中国并不排斥外来宗教。此外,佛教在中国虽有不同派别,世界上的伊斯兰教亦有派别,但两者均不如基督教派别之多。佛教甚少因教派不同而相互攻讦,基督教也有相互攻讦的情况。更有甚者,中国从

未发生宗教革命或宗教战争,反视欧洲的宗教战争,有长达数十年或百年之久者。中国能免除宗教战祸,是理性的表现。

中华文化理性的内涵中包含务实的因子。所谓理性,除合情合理的理念之外,尚须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问题,有时不可全凭理想而作为,这是务实的一面。中国历史上也有被少数民族统治的时候,而且时间相当长,如元代的蒙古族,清代的满族。中国在此强大武力压境时,会暂时忍耐,容忍其政治力量,但以汉族土地之广,人口之多,时机来到时,自会起而复兴。在忍耐的期间,以中华文化的优势,对入侵的民族加以同化,发挥其涵摄作用。汉族政治的复兴,不是驱逐异族,也不是以杀戮报仇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上的问题,而是将外族化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与中华文化合为一体,说明中华文化的现实性与涵摄性,原因是中华文化没有强烈的宗教观念,因而也缺乏强烈的民族意识,包容性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惟至清末时,情况有了变化,民族意识因而加强。

外教传入中国后发生冲突者,起自清初的西北回教。回教自唐传入中国,颇能相安无事,原因是回教徒不向外传教,仅由血缘关系维持其宗教发展,故无宗教上的冲突。他们以贸易为主,为了在华永久居留,因而自动学习中华文化。在华回民居高官者亦多,生活颇为富裕,在心理上,自认为居留国的一分子,接受中国文化(华化),直到清初,因政治关系,受到清廷的歧视,至清末,演变成西北回民反清运动与云南回民事变,主要原因非因宗教而起,而是清廷的政治迫害,或为汉回之间因小事冲突,清廷则借故加以镇压,造成汉回冲突的扩大,回民大受其害。

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对近代中国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为教案之多,中国付出惨痛的代价;一为介绍西洋文化来中国,推动中国现代化。前者可以说是文化的冲突,后者可以说是文化的融合。中国对外来文化——物质文化与科技文化并不排斥,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入西洋器物与科技,曾受到相当大的欢迎,即为明证,但天主教教皇禁止中国教民敬天、祀祖、祭孔,则违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因之康熙年间开始禁

教,首次造成中西文化的冲突。鸦片战争后,教案增多,最后引发义和团事件。

中国的政治与宗教早已分离,宗教的排他性亦早已不存在。目前已有有人在推动弘化院,主张弘扬儒、释、道、耶、回五教至尊,发扬忠恕、慈悲、自然、博爱、清真的精神。这些都是人类文化进步的表现,也是现代人努力的结果。各种宗教,各有其特殊的信仰与理念,欲其放弃特色,而成为统一的信仰,似乎不太可能,但文化是多元的,人类至少可以发挥其理性的一面,相互尊重而不排斥。

本集收集本人几篇小文章,只是对几个小问题的初步研究,说明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贡献。《中华丛刊》的出版、翻译名词的统一、基督教教育会、广学会等四篇文章,是属于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鸦片问卷调查与禁烟运动两文,是属于改良中国社会风气的贡献。江苏省的教案一文,则为说明文化的了解实有助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王树槐

目录

CONTENTS

卫三畏与《中华丛刊》

- 一、前言 / 1
- 二、《中华丛刊》的缘起 / 5
- 三、卫三畏东来接管发行事务 / 7
- 四、《中华丛刊》的内容及销路 / 10
- 五、结论 / 15

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

- 一、前言 / 19
- 二、早期的肆应 / 20
- 三、传教士的努力 / 25
- 四、国人的筹维 / 31
- 五、失败的原因 / 41
- 六、结论 / 47

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

- 一、前言 / 50
- 二、益智书会 / 53
- 三、教育会的组成 / 58

- 四、出版事业 / 65
- 五、出版事业不振的原因 / 69
- 六、结论 / 76

清季的广学会

- 一、前言 / 85
- 二、缘起与组织 / 86
- 三、经费 / 93
- 四、政策与工作 / 101
- 五、刊物 / 109
- 六、结论 / 116

清季江苏省的教案

- 一、传教概况 / 123
- 二、反教初期 / 125
- 三、还堂纠纷 / 127
- 四、教案高潮 / 129
- 五、结论 / 137

江苏省的烟毒与禁烟运动

- 一、江苏省的烟毒 / 141
- 二、禁烟运动 / 152

鸦片毒害——光绪二十三年问卷调查分析

- 一、前言 / 163
- 二、鸦片来源 / 166
- 三、吸烟原因 / 170
- 四、吸烟者类别 / 173
- 五、吸烟概况 / 176
- 六、烟毒的影响 / 177
- 七、戒烟 / 181
- 八、结论 / 183

卫三畏与《中华丛刊》

一、前言

研究中国近代史者,大都知道这本有名的杂志《中华丛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①,因为从该刊中可以找到鸦片战争前后这一段时间的许多珍贵史料。该杂志虽不是西人在华创办的第一种英文刊物,但却维持二十年之久,销路遍及全球,是一种非常成功而有影响力的杂志,在中国报业史上,自有其地位。研究中国近代史者,多注意搜集其中的资料,自不必特别注意其发行的经过,因之

① *The Chinese Repository* 原无中文译名,故译者多随心所欲,戈公振译为《中国文库》(见其著《中国报学史》,页82)。陈恭禄亦译为此名(见其所著《近代中国史史料评论》一文,载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卷三,期三,页546)。梁嘉彬译为《中华见闻录》(见其著《广东十三洋行考》,页2)。王治心译为《中国的仓库》(见其著《中国基督教史》,页158)。日人译为《支那丛报》(见昭和十六年丸善株式会社影印之 *The Chinese Repository*)。郭廷以先生译为《西儒耳目资》,似有所据(见其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册,页46)。李定一译为《华事汇报》(见其著《中美外交史》,第一册,页57)。黄嘉谟先生译为《中华丛报》(见其著《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页252)。作者因见《中华丛报》译名较佳,故取此名。酌改为《中华丛刊》。本文承黄嘉谟先生提供不少意见,特此致谢。

部分有名的学者,竟未能确知其详细情形^①,不足为怪;至于研究报业史者,则非仔细研究不可。然而我国有名的报业史家戈公振^②,他撰有《中国报学史》,对此杂志的介绍,错误甚多,极不正确。

戈公振对中国报学史的贡献是无可讳言的。民国二十一年(1932)西人白瑞华(Roswell S. Britton)于其所著《中国报纸》(*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 - 1912*)的序文与书目中,曾特别推崇他的书。^③四年后,林语堂著《中国报刊与舆论》(*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亦对戈书称赞备至。他说:“若无是书,我几乎无法下笔。”^④

戈公振的书固然有其贡献,但错误或值得商榷之处甚多。兹略举其第三章“外报创始时期”前五页之错误如下。对当时报刊遗漏之处,尚未计入。

(1) *The Chronica de Macas*, 于 1836 年停刊,而戈书谓 1838 年停刊。^⑤

(2) *The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a de Macao*, 于 1838 年 9 月 5 日创刊,戈书谓“发刊于 1839 年 11 月 9 日”^⑥。

① 罗家伦先生谓该刊为“英国人出版”,共“二百四十号”,似有商榷的余地。该刊主要负责人为裨治文(E. C. Bridgman)与卫三畏(S. W. Williams),均为美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虽为创刊人之一,但该刊发行至第三年(1834),他即逝世。所云共二百四十号,亦不正确,该刊自 1832 年 5 月起,每月一期,从未间断。然而 1851 年 8 月至 12 月则合出一期,合计共为二百三十二期,外加索引一卷。(罗家伦:《研究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武大社会科学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31 年 3 月。)

② 戈公振,原名绍发,字春霆。民国初年曾参加《时报》的编辑工作,后转至《申报》工作。他自己也想创办《生活日报》,惜未成功。民国十四年,他在上海“国民大学”讲授新闻学,开始撰写《中国报学史》,次年稿成,由商务印书馆于十六年刊行,至今已印行七版。见戈宝权(戈公振之侄)所撰之前言,附于 1955 年所印之第六版上,台北学生书局曾翻印一次,故至少已有七版。

③ R.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 - 1912* (Shanghai, 1933), p. v. & p. 133.

④ Lin Yu-tang,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Shanghai, 1936), p. 79.

⑤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1843), p. 110.

⑥ 同上。

(3) *The 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 于 1833 年 9 月停刊, 而戈书谓于 1832 年 4 月 14 日停刊。^①

(4) *The Canton Press*, 发刊于 1835 年 12 月 12 日, 而戈书则谓“发刊于 1835 年 9 月 12 日”^②。

(5) *The Canton Miscellany*, 发刊于 1830 年, 戈书谓 1831。^③

(6) *The Friend of China*, 于 1836 年迁至上海, 而戈书则谓于 1866 年迁上海。^④

(7) *The North China Herald*, 于 1867 年 1 月 5 日增发 *The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而戈书谓于“1870 年 1 月 4 日又发行 *The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但不久即合而为一, 易名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实际上, 1870 年 1 月 4 日是该两刊合并易名的日期。^⑤

(8) 戈书谓《海国图志》所载之“夷情备采”、“大率”译自当时澳门所发行的六种葡文报纸, 并谓“‘澳门月报’似即 *Chronica de Macao* 之译文”。此种说法值得商榷之处甚多。“澳门月报”亦非 *Chronical de Macao*, 而很可能是 *The Chinese Repository* 的中文译名, 因其中部分文字

① K. S.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 - 1844* (New Haven, 1917), p. 180.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1955, 北京) 页 82。

② Samuel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Shanghai, 1917), p. 459.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页 82。

③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1849), p. 435.

④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p. 459;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页 83。以上错误, 作者疑系排印之误, 经与第一版核对, 始知原版即有此错误。

⑤ *Encyclopaedia Sinica*, p. 459. 兹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有 *The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Vol. 5 and Vol. 6 (1869), 每半年为一期, 由此推知, 该刊发刊于 1867 年为正确, 至于两刊合并与易名日期, 均在 1870 年 1 月 4 日, 近代史研究所藏有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卷四, 第一四〇期, 即启用此新名, 其第三卷仍称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

已能确定译自该刊。^①

戈公振不仅不知道《澳门月报》与《中华丛刊》的关系,且其对《中华丛刊》的介绍,亦大错而特错,兹将其介绍文的前半段抄录于后:

The Chinese Repository(译意《中国文库》),发刊于1832年5月,为美国医生柏克(Peter Parker)所创办,每月一册。执笔之知名者如马礼逊、郭实腊等,至1853年停刊。^②

他的短短四十余字的介绍文中,居然有三点错误:

1. Peter Parker 的中文名字是“伯驾”,而非“柏克”。此点错误尚无关紧要。

2. 伯驾不是《中华丛报》的创办人,他当时尚在美国,其来中国,系在1834年10月。^③ 创办人究竟为谁,文内解答。

3. 该刊至1851年年底停刊,并非1853年。

近代学者引征戈公振的书很多。引征该书错误之处者亦有之。^④ 今日世界上存有《中华丛报》全套者已不多。大陆“中国史学会”编辑

① 《夷情备采》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澳门月报》,下卷包括《华事夷言录要》《贸易通志》、与《滑达尔各国律例》(*De Vattel: Law of Nations*)。后者原书已注明为“伯驾译书”,一小部分为袁德辉译书,自非译自葡文报纸,其他两文译自何处,则难以确定。唯林则徐所雇之四位译员,据裨治文云,均通英文,并未提及其中任何一人通葡文。他提及四处受教育的地方,亦无一人在澳门受过教育(见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8 (1839), p. 77)。且林则徐于1839年到粤,其译报自在抵粤之后,而 *Chronica de Macao* 已于三年前停刊,当时能否找到该刊尚成问题,而林则徐所留心者为西人对禁烟之反应,自不至去翻译旧报纸。至于《澳门月报》是否即《中华丛刊》,尚难确定,因为部分译文系东凑西拼而成,不易在原刊上找出。今找出者有《论茶叶》一文,译自《中华丛报》卷八,页158-163,系摘译而成,前后次序颠倒。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页83。

③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1929), p. 218.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1912), p. 556.

④ 如王家俭先生最近出版之《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台大,1964)页52,即为一例。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一种《鸦片战争》时,尚未能亲睹该刊的全部,故于书目解题云:

这份期刊是在广州出版的,只有一个时期(1839年)是在澳门出了几期,这期刊是季刊,即一年应出四本,但时常脱期。自1832年5月至1851年12月,共出了二十本。^①

这完全是臆测,其中错误,较之戈公振,有过之而无不及。故作者深感有纠正此种错误的必要,并借此机会,将该刊发行经过及其内容略为介绍。

二、《中华丛刊》的缘起

1807年,伦敦传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东来,是为新教士来华的第一人。

最先具有发行《中华丛刊》的理想者,似为马礼逊与米怜(William Milne)两人。他们曾于1815年在马六甲发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8年设“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于该地,即由该院出版该报。^②马礼逊等除出版中文报纸外,亦于1816-1821年间在马六甲发行 *Indo-Chinese Gleaner*^③,又于1826年发行英文杂志 *The Malacca Observer and Chinese Chronicle*,每半月出刊一次。^④翌年11月29日,该刊登出拟将发行英文季刊的启事一则,大意是:因鉴于西人对中国缺乏认识,有求进一步了解的必要,拟发行季刊一种,借以增

①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上海,1955),册六,页491。

② 麦沾恩(Geo. H. Mc Neur)著,胡簪云译:《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1939,上海广学会),页30。

③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1849), p. 435.

④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6), pp. 147-148.

进西人对中国历史、文学、哲学、政治、风俗等各方面之了解,并附登时事新闻,评介有关中国之西文书籍。拟定名为 *Indo-Chinese Repository*,由英华书院发行。^①由此定名与目的看来,可证明马礼逊等早具有发行《中华丛刊》的志愿,只因中国政府限制太严,故拟于马六甲实现其理想。

美国此时亦注意向海外发展传教事业,1810年,“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成立,首先于1829年派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与雅俾理(David Abeel)来华,次年2月抵广州。^②

美国传教士来华,多得力于美国在广州贸易的商人柯利芬(D. W. C. Olyphant)之助。他鼓励美教士来华,供给免费船位,共达五十一位之多,并愿负责“美国海外宣教会”派来的传教士的第一年生活费用。他在广州“夷馆(Factory)”内租有房间,免费供给传教士使用,达十余年之久。^③《中华丛刊》之所以能发行,亦多由于他的协助之故。马礼逊曾表示,希望美国布道会赠送印刷机器。^④恰好当时有人赠送纽约毕利克尔街(The Bleeker Street)长老会一套印刷机器与铅字,经过柯利芬的劝说,该教会将此设备转赠“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印刷机于1831年12月运抵广州,铅字则迟数月始到。^⑤

裨治文等到广东后,即与马礼逊等人合作,组织基督契团(The Christian Union at Canton),马礼逊的刊发《中华丛刊》的理想,便寄托在裨治文身上,当机器运到广州后,他们便决定由基督契团负担第一年的

①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6), p. 149.

② Latc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217.

③ Joseph Trac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 (Worcester, 1842), p. 264; F. W.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 W. Williams* (New York, 1889), p. 39, 77-78.

④ *The Panoplist and Missionary Herald*, Vol. 26 (1827), p. 366.

⑤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1849), p. 435.

刊发费用,由裨治文主编。^①此后便由柯利芬担保,如该刊因发行而有所亏累,由他捐钱补充。^②而该刊自始至终,颇能自给自足,后虽有亏空,但未累及他人。^③

由以上事实看来,《中华丛刊》的创刊,以马礼逊、裨治文、柯利芬三人的功劳最大,而真正的创始人,则以裨治文、马礼逊二人为主。

三、卫三畏东来接管发行事务

《中华丛刊》的创办人虽不是卫三畏,但他对该刊的贡献,不低于裨治文。卫三畏抵广州时,《中华丛刊》已出至第二卷第六期,此段时间,由裨治文负全责。司梯文(Edwin Steven)曾协助一段时间。卫三畏来华后,即由他负责全部印刷与发行的事务,并协助裨治文的编辑工作。1844年他回美后,又由裨治文负全责。1847年,裨治文转往上海,则由另一位裨治文(James G. Bridgman)负责,至1849年9月卫三畏返华为止。^④此后仍由卫三畏负全责,直至该刊停止时为止。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 - 1884),美国纽约州人,生长于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其父母皆为虔诚之教徒。其父一生从事文化事业,身为出版家、报纸编辑、印刷者。^⑤此种家庭背景,影响他的一生

①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221;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 92. 引裨治文的信,但 Tracy 云 Christian Union 只负责 3/4 的费用,而其余的 1/4 会落到“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身上。(见其所著 *History of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p. 224.) 未注明史源,似不可信。

② Joseph Trac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 (Worcester, 1842), p. 264; F. W.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 W. Williams* (New York, 1889), p. 39, 77 - 78.

③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XI. Index. Editorial Notice. p. 3.

④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9 (1880), p. 680; *Life & Letters of S. W. Williams*, p. 163.

⑤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 W. Williams*, pp. 6 - 7.

事业与兴趣极大。他小时好静,假日多在主日学校度过。1829 年入中学,1831 年入勒瑟拉学院(Reusselaer Institute),习植物学与化学。^①

1832 年,“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运送之印刷机及铅字等已抵广州,该会向卫三畏的父亲征求一位青年去广州主持印刷事务。他立刻推荐其子,并即通知卫三畏,请他担任此职,卫三畏因不满所读学院,亦极愿接受此职,唯希望先学习一些印刷方面的应用技术。这是他唯一的要求,并坚持此项要求。“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本盼他早日起程,也只好答应他的要求。他学习应用技术十个月之后,于 1833 年 6 月 15 日起程东渡,10 月 25 日抵黄埔。^②柯利芬对他亦极协助,卫三畏感激之余,曾将他的第三个儿子取名柯利芬(Olyphant),以致谢意。^③

当时传教士多与西商住在广州城外的“夷馆(Factories)”内,根据可靠的记载及图片,“夷馆”多为三层楼的建筑物,至少亦有两层,甚为宽敞。^④然而卫三畏的记载,尚认为不方便,不卫生;尤以后排房屋的湿气与恶臭,令人难受。^⑤《中华丛刊》的印刷室即设于美国夷馆“宝顺行”^⑥的后排房屋中。

由于清廷禁止传教,分发宗教性的书籍亦在严禁之例,所以当时传教士的印刷工作,尚须秘密进行,但仍难逃清吏的查禁。^⑦传教士乃决

① The Like and Letters of S. W. Williams, pp. 31 - 36.

② 同上, pp. 39 - 41, p. 47, p. 51.

③ 同上, p. 182. 此子生于 1852 年。

④ Williams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London, 1882), p. 24;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1918), p. 64, p. 71; *The Chinese Repository I* (1832), p. 212; *Encyclopaedia Sinica*, pp. 170 - 171.

⑤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 W. Williams*, p. 56.

⑥ *Encyclopaedia Sinica*, p. 171. 称美国夷馆为“宝顺行”,梁嘉彬的《广东十三洋行考》称美国夷馆为“广顺行”。何者为对,或者两者皆对,尚待考证。

⑦ *The Life & Letters of S. W. Williams*, p. 68;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1900), Vol. 2, p. 328, p. 345; *The Panoplist and Missionary Herald*. Vol. 32 (1836), p. 203.